

龙岩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龙岩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岩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月

目 录

光辉典范

纯真赤子心

- 老归侨黄复康生平事迹 黄铮英 (1)
深切怀念爸爸 —— 黄复康 黄灼人 黄铮人 (15)
郭秉宽教授生平 郭 已 (20)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本刊资料室 (26)
深情的回忆 亲切的怀念 郭 已 (33)

崛起闽西 功昭福建

- 魏金水传略 郑学秋 (37)
忆“不倒的旗手”魏金水二三事 陈殿南 (46)

为祖国的革命、建设奉献一生

- 作家、戏剧家吴荻舟生平 郭 翔 (48)
忆念吴老师 郭 翔 (53)
著作简介 [吴荻舟] (57)

忆旧谈往

- 七十年变迁 张中良 (63)
李友邦与台湾义勇总队 方 中 (70)

华光轮海难追记 苏禄洲 (76)

龙岩的婚丧喜庆礼俗 林锦发 (81)

旧貌新颜

东宝山展新颜 张俊华 (89)

龙岩黄岗水库和水利渠道建设 连子丹 (93)

龙岩九曲岭水电厂 黄鸿民 (98)

铜钵的农田水利 吴礼庠 (101)

胜景今昔

旅游胜地 — 石山园 郭达根 (103)

佛教旅游圣地天宫山 曾玉照 (连炎整理) (108)

月异年新天宫山 李来鉴 (112)

赤水天后宫 饶丹丹 (115)

逸闻拾掇

万安逸事 祈 乐整理 (117)

高知名录

龙岩籍高级知识分子简况 (六续) 本刊资料室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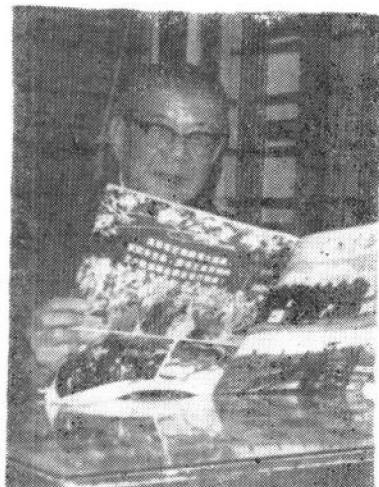
来函 订正 (139)



纯真的赤子心

——老归侨黄复康生平事迹

铮 英



黄复康，原名文橙，别名信秋、祖香、雯晴。1902年12月9日生于福建龙岩赤水桥村一个“三代五贡举”的书香世家。但从祖父那辈起，他家便与功名无缘。祖父是个穷书生，生有六男一女，因收入不丰，生活并不宽裕。父亲黄瑞枢，排行第二，为了家计，未成年便到江西大余县聚昌号商店当学徒。黄父为人忠厚老实，做生意几十年谨守规矩。

黄复康出世那年，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婚后多年，才有他这么一个儿子，自然倍觉疼爱，但在管教上却丝毫不放纵，要求颇严。黄复康从小便在“谦逊忍让、忠于职守、自求长进、诲人不倦、勿见异思迁”的庭训下孕育长大。正是这些做人处世的信条，对他日后的成长，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一、忆往昔，艰难岁月

少年时代的黄复康，因父早逝，家道中落，他仅在龙岩中学读了一年便辍学务商。最初，他在本镇德峻堂药材店当学徒。16岁完婚后便自挑行李，跋山涉水步行14天到江西大余县原父亲与叔父合股的瑞丰祥杂货店学做生意，叔父虽然表示欢迎他，但要求必须由学徒做起。

店里的生意十分兴隆，每天由赣州开来的货船上均有店里的货物，未成年的黄复康，每日清晨，脚著草鞋，肩挑百余斤重的货物，在距离约300公尺的河坝与货仓之间往返多次。接着秤货，卖货……，一日下来，疲惫不堪，晚上还要包装好明日应市烟丝，学习复核帐本等，不得有误。此外，店里整年均有应节性的紧张工作，春季制梅胚，李胚；夏季打纸钱；秋季制中秋月饼；冬季制南安板鸭。每到秋季制中秋月饼的一段时间，做徒弟的非得干至深夜两、三点不得就寝，其辛苦状，实不堪言。经过三年严格的学徒生活，磨砺了他的意志，培养了他任劳任怨、谨慎勤敏，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学徒期满，黄复康承叔父之命前往广东省南雄县，在叔父们合股开办的义昌纸行当记帐员近4年。

二、投无路、首次“过番”

1925年。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了寻找生活的出路，黄复康曾任过广东省宝安县府的收发员，也当过厦门大学总务处的办事员，但那些“饭碗”总是捧不长久。1927年夏，黄复康告别了年迈的母亲和娇嫩的妻儿，远涉重洋，抵达荷属东印度（当时为荷兰统治的印尼）苏门答腊的亚沙汗。

初时，他在堂兄经营的永联昌商行任副经理。然而，南洋并不是世外桃源，那时，荷印当局对其殖民地的控制是严厉而残酷的，由于“弱国无外交”，殖民主义者对华侨不但歧视、排挤，

甚至为所欲为。他们把中国人卑称为“东亚病夫”，“亡国奴”，华人骑自行车经过大农园的办公楼或在庄园主的住宅前，必须下车，还得遥向敬礼，否则，会被庄园主放出的狼狗咬得遍体鳞伤或遭受所谓“拘留教育”。在异国他乡，华侨根本不被当作人看待，他们流血流汗，倍受沉重剥削外，常常连人生安全也无法得以保障。黄复康目睹这一切，心中埋下了对现实的愤懑与不平。深深感到：“海外孤儿”要生存下去，只有团结起来，靠集体互助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同时，还必须从教育入手，改变华人社会文化落后的状态，积极培养能为华侨争光的有知识文化的华侨子弟。黄复康决心致力于侨团和教育事业的工作。他开始主动接触当地侨胞，并常把侨胞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侨胞们也将他当作亲人一样，有事总喜欢找他商量。那时的亚沙汗，华侨众多，但只要提起黄文橙，则几乎无人不晓。不久，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堂兄店铺受到冲击而破产，他便转到由华侨筹建办起的学校工作，并被委任为培善中学（中、小学）的事务主任兼董事会秘书。

1930年，年迈的母亲在故乡病逝后，黄复康便将妻子、儿女及妹妹接到亚沙汗。黄复康在亚沙汗虽只三年时间，但由于他待人诚恳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深得当地侨胞的赏识。他被任命为亚沙汗中华商会、华侨进出口、华侨糖米商等商会的秘书。他身兼数职，事务繁杂，经常加班加点干，星期天也难得休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培善中学校长王志瑞和侨生教师张希石等进步青年，并与他们常接触。对这些有血性，不甘做奴隶的有志男儿，黄复康深怀钦佩之情。在他们的影响下，他积极支持学校教员向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教育，由于该校的校歌采用《马赛曲》作为曲谱，且校内还常传出《国际歌》的歌声。为此，荷印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王校长被驱逐出境，张老师被流放，一部分学生被“软禁”，黄复康也因此被警告，并受到监视。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国土，祖国处于水深火

热、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同年8月15日，南洋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首先倡议“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长期筹款资助抗日军队与受难的人民。总部设在新加坡，亚沙汗也成立了分会，黄复康担任该会的秘书兼宣传主任，实际上一切活动由他负责。他有感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已使华侨处于海外孤儿的地位，若亡了国，则海外华侨将沦于更加悲惨的境地。因此，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勇敢地挑起了动员侨胞筹赈钱物的重担，积极组织募捐队，四处宣传鼓动，使当地华侨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下，亚沙汗的侨胞不顾荷印政府的压制，小商小贩举行义卖；人力车工人举行义拉；连小学生也背上募捐箱，挥着小旗子在大街小巷卖花筹款。黄复康的妻子彭君娇将亲手做的点心和食物拿到筹赈大会的夜市上义卖。黄复康本来已经够忙了，由于没日没夜地劳累奔波，他不幸患了肺病，吐血不止，不得不住院治疗，荷印殖民政府对他恨之入骨，总想置他于死地，不等他病愈，顿下毒手，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于一个星期之内离境。此时，黄复康已身无分文，虽然也有不少侨胞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接济，均被他一一婉辞。他拍卖部分家具杂物，才筹措了只身回国的路费。当地侨胞闻知他离境回国，纷纷前来洒泪送行，依依惜别。

三、入无门，再次“过番”

1938年，黄复康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祖国，当他满怀救国的希望踏上故土时，曾以为虽不能在海外为祖国致力于抗日救亡工作，却有可能在祖国的国土上直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那就更好了。他相信政府当局一定会为他这样一位在海外从事爱国活动而被驱逐出境的人安排工作。然而，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当他回到江西老店时，见到的依旧是一幅民生凋蔽、哀鸿遍野的凄凉景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海外侨胞节衣缩食捐献的抗日物资，大批落入他们的私囊。在军事上，则假抗日真反共。他回到

龙岩家乡，虽受到龙门青年的热情欢迎，并参与了抗日宣传活动，但国民党政府却十分厌恶。他们要搞磨擦，不抗日，也不许别人抗日。对这样一位抗日爱国的归侨，不表欢迎，更别谈给予工作了。目睹这些丑恶现实，黄复康大失所望。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考虑到妻子儿女尚在海外，只得悲愤满腔地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再渡重洋到新加坡。

他原名文橙，因恐新加坡政府不让入境，改名复康。到新加坡后，受朋友邀请，他在一间名为光华栈的商店任经理。并将妻子儿女分三批从亚沙汗接到新加坡。经过他的努力，光华栈商务日益发展扩大，后改名为光华有限公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新加坡沦陷时，日寇为报复华侨的抗日活动，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黄复康一家避到郊外朋友家里，才得以幸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新加坡的革命形势很好。当时，正值陈嘉庚先生回国参观革命圣地延安归来，他把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实况告诉海外人士，并指出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希望，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真正抗日救国的革命队伍。从此，黄复康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对共产党、毛主席产生了信任与爱戴！并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以实际行动支援当地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尼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当时荷兰殖民主义者对印尼革命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对来往于印尼与新加坡海域间的华侨船只也不放过，并且野蛮地进行袭击和扣留。这一反华行径，激起了新加坡华侨的愤怒，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带领下，掀起了抵制荷兰商船的浪潮。黄复康在这场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中，不但积极动员有关行号不给“KPM”船务公司运货与卸货，而且还凭着他对印尼、新加坡贸易信息灵通的条件，向新闻界揭露了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许多暴行。在当时，作为一个与荷印尚有商业利害关系的商家，敢于如此旗帜鲜明地同荷兰殖民主义者针锋相

对，确实难能可贵。因而他深受维护华侨利益的新闻记者同仁的敬重。

四十年代后期，黄复康担任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务兼秘书，同时担任龙岩会馆副主席、新马中华汇总业公司常委、新加坡华侨出入口商公会常务等职。不久，黄复康又受陈嘉庚推荐，兼任福建会馆教育科主任和教育促进会主席。当时，在英国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下，这是一项站在斗争前沿的工作。但黄复康不畏强暴，乐意承担，并为有了为发展华侨教育事业作贡献的机会而感到高兴。在他的支持下，许多进步人士能在学校顺利开展工作。

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办了五间中小学校，教职工约200多人，学生5000多人，是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和教育促进会下设干事12人，黄复康自身商务虽十分繁忙，但仍热心教育工作。他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邀集教育科的干事到家里共商五校有关事宜。在此期间，由于得到进步名教育家薛永泰先生的协助和指导，在所辖学校中介绍了国内的教育方法，并实施一些新制度，同时在提高教学质量、扩充校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好景不长，1948年，英殖民主义者为了取缔革命组织活动，宣布了“紧急法令”，致使不少革命人士和一直坚持与日寇斗争的抗日游击队被拘禁、流放，甚至惨遭杀害。教育科干事中有七人被拘禁，校长、教员和学生亦有多人被捕，并多数被驱逐出境。黄复康也多次被传讯、威胁。在那些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黄复康还担任了爱国侨团爱华社的名誉社长职务，他积极支持、团结进步青年，并与他们一起坚持开展各项对祖国有益的活动：爱华社采取图片展览，散发报刊，组织歌舞队慰问演出等形式，向新加坡华侨宣传祖国争取民主解放的道理，同时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没落。新中国诞生前夕，爱华社的社员日夜赶制五星红旗，他们的心愿是：在祖国开国大典的喜庆日子里，让这面象征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光辉旗帜，同时在异国他

乡的上空高高飘扬。新中国成立后，爱华社社员通过收集记录新闻，出版了《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表的全篇讲话》，以半卖半送的方式，在华侨地区大量散发，结果影响很大。该社在出版伍修权讲话全文的当天，即被英帝当局封闭。

四、了心愿、举家回国

由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英殖民主义者的反动行径，激起了广大华侨青年的极度不满，黄复康的儿女们也和许多爱国青年一道参加一些进步组织活动，结果住宅被搜查，儿子也被拘禁，后经保释，1949年6月，他将儿子送回黎明前的祖国。在这之前，大女儿原在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南侨日报》工作，1947年底，他把女儿送到香港达德学院学习，后于1949年初到潮汕解放区参加解放战争。政治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黄复康只好辞去教育科主任的职务，同时将最小的女儿也送回祖国学习。1952年9月下旬，这位怀着报效祖国之心的海外赤子，携同老伴，毅然离开新加坡回国，他真诚地期望着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竭尽绵力。

国庆三周年的喜庆日子，黄复康到达广州。他喜出望外的是，这次回国与十余年前回国所得到的待遇竟有天壤之别。刚下火车，他便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的国庆三周年大会，接着又被请到首都北京，参加华侨回国观光团。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参观和视察了东北、华东、中南等十多个省市，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接触了许多翻身做主的人民。通过这些活动，他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对新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决定留居祖国，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

五、诚报效、尽心尽力

由观光团归来后，他受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饶彰风部长的鼓励和挽留，担任了公私合营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兼

贸易部经理等职。他感慨万分，感到有机会发挥自己在海外所积累的国际贸易经验和广泛的海外关系，为祖国的建设服务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在任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工作，日批阅函电平均达50件以上，加上接电话，会客及答复业务人员的询问等工作，每天超负荷地工作十几小时，从无怨言。为能得到有关投资方面的材料和最新贸易信息，他常向海外老朋友去信了解国外有关行情，并委托专人每月剪寄南洋商报的重要新闻。对住在华侨大厦的侨胞，他也常抽空亲临拜访，向他们了解有关外贸方面的情况，同时宣传解释党的有关政策。

1955年，黄复康调任华南企业公司，和中国杂品出口公司副经理，这段日子，是黄复康自称为：回国后精神最为振奋的时期。由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他有职有权，虽是非党员干部，却同样到北京参加总公司的会议和外贸部的会议。所以他心情舒畅，敢于大胆工作，使该公司1956年的进出口业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口商品的实绩比1955年增加了一点四倍，联系的客户增加了四点六倍，交易的新商品有130多种；进口业务方面，也在自备外汇的基础上完成全年度计划。该公司在协助国营对外贸易部门对东南亚地区扩大土特产、工业品和新商品的推销上，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经常通过海外华侨股东了解海外市场对于商品的需要，协助国营公司组织货源及时供应。像缝纫机、陶瓷品、手电筒、锁头、烟叶等，都是由该公司打开或者恢复了销路。然后再由国营公司或香港、澳门的客户订立包销合约的。在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上成交的5000多万元交易中，约有10%是通过该公司成交的。

黄复康工作责任心很强，连节假日也常到公司或仓库检查工作，并对值班的职工表示关心和慰问，深得同志们的好评。

1959年，因工作需要，黄复康奉派到香港中孚行工作近两年。

1961年，组织上为了更好地发挥他海外关系广泛的优势和考

虑他年纪较大的原因，将他调到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任副总经理职务。此时，黄复康虽年近花甲，但他除了完成公司分工的任务外，还积极主动地做好对华侨宣传、接待等工作，并经常参加省政协、省侨联、省工商联的各种社会活动。

六、真情义、廉洁自律

黄复康关心侨务工作，热爱侨务工作，1956年，在参加全国侨务工作扩大会议时，他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多年来这股幸福的暖流，一直激励着他更好地做好侨务工作。他是全国侨联常委，又是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所以常收到海外华侨、归侨或侨眷的来信，申诉有关房产、工作、生活、子女上学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负责地向有关部门如实反映，并配合协助侨务部门调查处理有关事情。如1954年，印尼观光团 龙岩籍团员 张潮海、陈文博向黄复康反映，龙岩在重新划分阶级成分时，将好几位因有侨汇或有存款的华侨家属划为地主，迫使这些人将存在银行的存款提出外，还向海外亲属要几万元汇款还余粮。黄复康知道此事后，觉得在处理上不符合党的侨务政策，不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认识到如不及时纠正此事，让印尼华侨观光团团员带着这些坏印象出国，将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他立即动笔，根据事实写成报告，向福建省侨委、中央侨委和邓子恢副总理反映，希望予以重视。后来，政府部门据此拨出一部分款项退回有关侨属，挽回了影响。

每年在广州举行的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他只要了解到曾有相识的海外朋友回来，一大早便乘公共汽车前往宾馆，争取在交易会开放办公时间前会见他们。他向海外朋友介绍祖国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他们投资。有时甚至还掏腰包设宴，利用吃饭时间交谈，致使中午经常无法休息。遇到接待对象提出问题需要协助解决时，他便主动同有关方面联系。由于他

待人热情、随和而又真诚实意，不少回国做生意或旅游、接亲的侨胞，哪怕与他仅一面之交，甚至不认识而只知其名者，只要有机会到广州，总忘不了与他通个电话或到他家拜访问候。这一来，他出钱出力，义务做工作的机会就更多了。有四位华侨朋友见他年事已高，经常自己雇车，甚至挤公共汽车去会见海外朋友，很不方便，便合伙买了一部丰田牌小轿车赠送予他，但他却将车转送广东省侨联。

回国以后，黄复康也曾遇到祖国大地出现乌云密布的时候，在“左”的路线冲击下，尤其是“十年动乱”刮来的急风骤雨，他与全国人民一样，被打得晕头转向。什么“华侨都是资本家、剥削者、特务、间谍”、“侨眷是反动的社会基础”等等，在这场复杂纷纭的动乱中，他感到迷惘，然而他牢记周总理的话：

“华侨绝大多数是爱国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他坚信党的侨务政策终会贯彻。为此，他接受了数不清的学习，批判、甚至被集中审查，不得不违心地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检讨。打倒“四人帮”后，黄复康一如既往，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重新振奋精神，投入侨务工作，当他见到许多归侨及其子女陆续离开祖国回到原侨居国或香港时，他虽然理解他们的心情，但仍尽力做解释工作，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全家没有一人离开祖国，并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黄复康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他与贤妻结发60余年，始终情深意笃，志同道合。老妻对他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尤为可贵的是，她思想进步，回国后，在丈夫的支持下，戴上老花眼镜，刻苦攻克文化关，终于从一个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迅速成长为一个热心社会工作的积极分子。她经常主动参加街道的侨务工作，并热衷于社会公益活动。曾任第二、三、五届广东省和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越秀区侨联副主席、区人委委员、广州市妇联委员、广州市致公党委员等职务。1978

年不幸病逝。他们养育的三个子女，均受过良好的教育，且有一技之长。其子黄清渠，1954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1957年获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曾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大女黄灼人，曾就读于香港达德学院，原任暨南大学后勤党总支书记等职；小女黄铮人，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现任广东省人民医院内科主任，中山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广东省政协委员等职。数十年来，他们一家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去爱我们的祖国。即使是在非凡时期，也从未动摇过。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事迹，受到人们的颂扬，报纸、杂志刊出文章宣传他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记者对他一家进行了录音专访，并向全国播出题为《合家欢愉颂党恩》的录音报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介绍他全家的新闻电影纪录片“归侨一家”。所有这些，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黄复康与千千万万的爱国归侨一样，十分关心新中国的建设，希望祖国迅速强盛。在建国初期，他对国内购买公债、捐献抗美援朝的各种战略物质等，都很热心、甚至拿出金银首饰和外汇等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同时将国外带回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希望通过办实业来振兴中国。在国家困难时期，他将投资股息全部捐献于华侨大厦的建设和支援家乡农业生产，并率先响应“进口化肥”的号召，以实际行动捐款进口了200吨化肥。他还千方百计地组织、动员华侨和港澳同胞，为缓解化肥紧张状态而积极捐献。

更值得一提的是，黄复康对祖国的教育事业一如既往，极为关注。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捐资于家乡的母校——开明小学，使该校解决了照明用电的困难。他还先后为广州华侨小学，侨光中学，暨南大学等捐资建校兴学。

了解黄复康的人都这样评价他：待人总是那样的热情大方，而待己则显得过于严谨。亲友或朋友无论贫富，凡有事或有病来广州找他，他总是慷慨乐助，并主动在食宿方面提供方便。不少

海外朋友还托他代购房屋，代付子女学费及生活费，或托办事、他也总是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尤其在印尼排华的那段日子里，许多华侨想方设法将款项汇回来托他代为保管，甚至将物品寄回存放他家，以至住宅的三楼及车房全堆满了物品。他和夫人还不时将那些物品检查翻晒，以防霉烂。他花费不少时间写信回复海外朋友托办的事，还要时时关照亲友委托保管的孩子们，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他那种热情主动，不辞劳苦，有始有终，严谨负责的态度，深得海外亲友，国内归侨、侨眷的敬佩和赞扬。他律己严，生活非常俭朴，黄复康一生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从不滥用手中职权为其子女搞特殊、“亮绿灯”。长期以来，他唯一的儿子和小女儿分别在远离广州市的黑龙江和内蒙工作。对子女的工作安排和调动问题，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过半点要求。1978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人住在光塔路的住宅，照理说，应是考虑将子女调回身边之事的时候了，然而，对此事他始终只字不提，这一生，他有求于组织的事真是太少了，直到去世，儿子仍未能调回广州。他那清廉，俭朴的高贵品德，至今仍为众人所追思。

七、献“四化”、赤热情怀

改革开放以后，黄复康与全国人民一样，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他决心以古稀高龄的余年，为“四化”做些贡献。

党和政府的器重，人民的信任，使他曾多次光荣地当选为省人大代表，1978年，他还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翌年，他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并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的常委。

1979年6月23日，是黄复康终生难忘的日子，在参加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他幸福地见到了叶剑英副主席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他们和他——一个老归侨亲切地握手，并照了像。回来后，他时常凝望那些照片，心想：党和政府对老归侨寄予多大的期望啊！在加速祖国实现“四化”的今天，自己该干些什么呢？

他认为：在对外贸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科学知识和资金方面，自己还可以充分利用长期建立起来的广泛社会关系，做些穿针引线的工作，透过以下记录的一组事实，可以看到，他在生命结束前的几年时间里，还在竭尽精力作出一系列的贡献：

——在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基于不少侨联结构不健全，甚至处于无人员、无经费、无会址的三无状态等问题，他与许崇德、廖钱等同志根据1978年8月党中央批准“全国侨联作为全国性的一级人民团体恢复活动”这一文件的精神，联名起草了一个提案，要求广东也和福建河北等其他省一样，把侨联列为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同样待遇。

——1977年，已届耋耄之年的他，为了解决我们国家工业油料紧缺问题，不辞辛劳，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在全国五届二次人大会议上，他与蚁美厚、伍觉天等华侨代表联合提出一项关于重新在海南岛大面积发展种植油棕，增加油料生产的提案，以具体数据说明油棕的重大经济价值和对国计民生的重大利益。因而受到大会的重视，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了此事。

——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他通过海外朋友搭桥，引进了美国农药厂最新式的技术和产品。之后，为推广新农药，美国某农药厂主动出资一万八千美元，在我国东北地区设试验站，通过技术交流，效果甚好，现我国已能生产几种最新农药出口了。

——他有感祖国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此，他鼓励在美国从事航天科学的研究的外甥回国讲学。动员他老朋友的两个儿子、年青的高能物理学家章义明和章礼南两位博士从美国来我国参加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获得好评，并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80年秋，他因重病住院未能参加全国人大第五届三次会议，但仍每天按时收听新闻广播和收看电视播出的大会盛况，他深感祖国前途大有希望，“四化”一定能早日实现，兴奋之余，